

三十五年来乐平政协工作的回顾

——为纪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四十周年而作

俞 镇 德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她的第一届全国全体会议代行了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自成立到今天，已经是四十周年了。

自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继续在国家政治生活以及对外友好活动中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也就从这个时期开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级地方组织陆续建立。乐平在江西来说，是个经济文化相对比较发达的县，故于1955年10月就开始建立政协乐平县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计有委员四十一人，中共乐平县委书记程宝财同志兼任主席，周志鸿同志任副主席，刘立云同志任秘书长，常委有十四名。我是1955年暑假后才随师范迁来乐平的，首批名单上我不是政协常委，但我当时是景德镇市政协常委。到1956年2月政协乐平县委员会去函景市把我的关系转来，我才参加县政协工作。自此，我除第一届时任常委外，从第二届开始就一直担

任副主席至今。值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四十周年之际，回顾三十五年来我参加政协工作的历程，谈谈政协乐平县委员会从成立、发展、停滞、新生、迈进的历史进程，以供大家参考，也不是毫无裨益的。但由于资料缺乏，文革前的一些资料已付之一炬。记忆所及，难免遗漏和讹误，尚请知情者予以补充和纠正。

一、“文革”前政协乐平县委员会的组织概况和忆及的突出工作。

（一）组织概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乐平县委员会成立于1955年10月6日，第一届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秘书长人选和常委，委员人数已如前述。常委中至今健在，而且仍留乐平的，就我所知，尚有彭友仁、余秉文、胡映辉、洪考生、王锦祥等同志。这一届委员会历时不足两年，共召开全委会两次，常委（或常委扩大会议）会十次。1957年6月24日就召开了第二届一次全委会。

政协乐平县第二届委员会委员人数增至六十五名。主席程宝财、副主席周志鸿、俞镇德、副主席兼秘书长徐炳和，常委增至二十三人。第二届委员会历时两年多，直至1959年8月才召开第三届委员会。这两年多中，召开常委（含常委扩大会议）共九次，主席办公会（含扩大会议）二十五次，各界人士座谈、报告会十五次，规模较大的集会三次。由于正在这届委员会期间，进行了反右派斗争，所以这届常委和委员中有胡廷龄、毛德波等六人被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4月乐

平县政协二届十七次常委扩大会议作出决议，撤销了胡延龄、王清河二人的常委职务和毛德发、白振华、崔廷杰、汪善祥的委员资格。因其它原因除名的委员还有陈建勋。这是乐平政协史上未届而有委员被除名的唯一最多的一次。

第三届委员会于1959年8月召开。这届的委员增至九十一名，这届主席为孟庆余，副主席为周志鸿、段兆昌（兼秘书长），陈冬玉和我。常委（含正副主席）三十一名。

这届委员会从1959年始，至1962年12月止，历时三年又四个月，三年多共举行主席办公会四十六次（含扩大），常委会（含扩大）十次，全委会两次，报告会八次，时事座谈会四十八次。

政协乐平县委员会第一、二、三届具体工作人员都只有秘书一人，长期由叶显模同志担任。

第四届委员会于1962年12月23日召开，这届委员会委员人数增至一百一十五人，主席仍为孟庆余、副主席增六人，为吕自成、饶玉鸾、徐炳和（兼秘书长），周志鸿、徐谦光和我。常委（含正、副主席）三十一人。

这届委员会的终止时间系1965年12月。由于资料不全，会议活动全貌有待查实后补遗。从现有资料查考却可得知：仅这届的第一年半（1961年底至1962年7月）共举行主席办公会十七次，常委（扩大）会七次，各类报告会、座谈会十七次。

从这届开始，设了驻会的副主席，由饶玉鸾担任，秘书长改由袁正海担任，在我记忆中，这时期还有一名工作人员，先后由李同富、张善义担任，但其起讫时间不详，有等查考。

第五届委员会于1965年12月28日召开。委员为一百一十

四名。正副主席人选和常委人数仍同四届。这届委员会成立后的翌年上半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记得自从1966年4月由我执笔起草的1966年县政协工作要点，和1966年4月6日袁正海送交我审核定稿的县政协学委会1966年上半年组织各界人士双周学习毛主席著作计划的安排稿件后，政协活动就被迫宣告终止各项活动了。至于县政协究竟于何时被砸烂，连办公场所也被占用，不知其详，据可查资料政协活动大概延续到1966年底，而我于1966年6月就开始被揪斗了。

(二) 活动概貌

由于“文革”前一直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地方政协工作自始至终我感到的是围绕协商通气、团结、教育，改造各界人士；促进各界人士的思想改造，以团结、教育大家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个宗旨来进行的。所以自第一届委员会以来直至“文革”开始，县政协的主要工作是：

一、大力开展政治协商活动。当时是进行间接选举，所以，每次选举前对选举委员会提出人大代表的候选人名单都要进行协商；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也要先行协商，如第一届委员会期间，就1956—1962年农业发展规划协商。第二届委员会就农业发展纲要的修正案、国民经济计划、1958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各阶层的分配推行数，如何组织各界人士开展献技术、献力量的“双献”活动等，都进行了协商。从1961年本会三届二次全体会议起就与县人代会同时召开，参预每年政府工作报告、检察院、法院工作报告、国民经济前一年计划执行情况和新一年计划、财政预决算报告的协商工作。

二、大力组织各界人士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进行政治理论学习，改造思想，提高认识。在我记忆中，这正是政协工作的大头，是政协最经常的活动。所有比较大的政治事件，政协都要组织在城的政协委员，各界知名人士（指学校党外副主任、有影响的教研组组长，名医师，工商联执委以上人士）进行学习座谈，座谈后还要发纪要，作决议，发声明等。对于工商业者则还专门举办学习班（后详）。1956—1957年间，送二十人去省、五十四人去地区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我与余师禹同志就于1963年下半年同时到上饶学习。

三、做好人民来信来访工作。自第三届起就有了提案，此后每届都有了提案处理工作；做到沟通信息，反映情况，提出建议，因而进一步密切了党和各界人士的联系。

四、组织部分委员在本县或赴外地进行参观访问。这项工作每届委员至少三次以上，也正是有这个机会，我先后多次去过涌山、共库、浒崦、洛口、塔前、临港、文山等地。总之，凡某处在某年内有个新成就，新成绩，新事件，就会组织委员去参观访问。参观访问的目的主要是转变思想，提高认识。每次回来还要组织委员赋诗、作画，谈感想、写参观小结，现在档案馆仍保留了一部分这种资料。据不完全统计，这几届委员会期间，共组织参观、访问达数十次之多。

五、走访委员，解决部分委员的实际问题。多年以来凡委员生病多去探望，委员中遇有实际问题，或由政协出面与所在单位研究解决，或由政协设法给予解决。如1956年从政协有关资料上就反映曾经给三个委员生活补助费七十元。

（见县档案馆资料3—1—23卷，5号第13页）

（三）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政协的一些大型活动

从建国起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我国的政治运动是一个接着一个的。为配合历次的政治运动，相应地政协都有些大型活动，仅就记忆所及择要简介于下：

（1）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来之时，政协举行了第一届二次全体会议，与工商联扩大会议同时举行，历时六天。主要组织工商业者学习中央文件，学习省、县领导的报告。通过反复讨论，促进工商业者自觉接受对资改造，推进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在公私合营后，又多次组织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座谈学习，克服工商业者的消极悲观情绪，处理好合作关系。为巩固、扩大学习成果，于1956年1⁰月创建了工商者政治学习班，先后共举办五期，参加学习人数有三百五十三人。学习班还有专人负责，占厚生、袁本安等同志都曾主持过这项工作。我也曾多次到学习班讲课。主题是谈通过学习改造思想的必要性。此外为提高工商业者家属的文化程度和政治觉悟，于1957年还举办过一次为她们而建立的业余文化学校，参加学习的达八十人。1960年10月又办了政治学校，共办五期，我县文教、卫生、工商界及其家属共有二百六十九人参加学习，学习内容是《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毛主席的《矛盾论》等三篇著作和三面红旗等，一直到1962年。1965年元月还举办过各界人士三个主义教育（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读书会一期，为期三个月，参加人数达四十余人。足见当时政协是把组织学习当作首要任务来抓的。

（2）整风、反右派斗争期间。县政协第二届委员会召开之时，正值整风，反右派斗争时期，1957年4月份中共中央已经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继省宣教会议之后，我

县政协也召开了各界人士座谈会，孟庆余同志动员各界人士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在这种会上，的确各界人士也有过不少过激语言。到本会第二届全委会时，适值反右派斗争已经开始，政协委员毛德发（工商界）在会间还作了适当的发言。于是这届全委会上就组织了对毛德发的批判，在政协揭开了反右派斗争的序幕。这次会议结束时，还作出了“号召全县各界人士深入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和“开展对右派反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的荒谬言论进行斗争”的决议。反右斗争在基层进行，我记忆中政协除在全委会上批判了毛德发外，还在小会上批判过胡延龄，此外没有组织过其他批判会。政协的另一工作就是当年的10月组织各界人士开展了以社会主义教育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大辩论。参加这一活动的有中医二十五人，牙医十人、宗教人士二人，社会人士三十人，共六十七人参加。开展了鸣放和大是大非的辩论，从而澄清了思想。由于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在这些活动中抓住片言只语，把过激语言无限上纲，致使伤害了一些人。不过因党的政策是“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所以在最后只有毛德发等四人被撤销委员资格，胡延龄等两人被撤销常委职务。

（3）组织各界人士开展向党交心活动。继反右斗争之后，在大跃进的年代里，于1958年4月下旬，全县知识界、工商界举行了“社会主义思想大跃进誓师大会”，提出了要把心交给党，交给人民。在这种“左”的思想支配下，开展了向党交心运动。县政协于是年五月下旬用五天时间集中了部份政协委员，民主党派成员，部分知名度较高的医师共二十一人，提出要把各人思想深处的资产阶级肮脏东西倾囊而

出，以达到大破大立，兴无灭资的目的。而提出什么“痛下决心，苦战五昼夜，实现三千条，力争五千条”的口号。当时我是参加者之一，为兴无灭资，的确给自己无限上纲，真所谓“狠斗私字一刹间”，以完成任务，实现对旧我的决裂。据统计仅三天时间，就以写大字报的形式，十九人共交心三千二百三十条，基本完成任务。

（4）交心运动之后，在知识界工商界中接着就开展了“献技术，献力量”的“双献活动”。1958年底告一段落。共有六百九十四人参加这一活动。通过这一活动共提出合理化建议九千八百八十四条，献计二千一百六十四件。还献出钩、铁、药品、机床等，献出房屋也有六十七幢。而后于年底举办了一个“双献”展览会，规模很大，共分序幕、工程技术、卫生、文教和工商业等五个馆。内容充实。我记得乐中、乐师的老师们为布置展览，不少人都连续几个通宵战斗，总想使本单位的能比其他单位的高出一筹。（这一活动是全省统一布置的。我县开展前曾往景德镇市参观。全省搞得最好的典型是信丰县，我曾参加省政协组织的参观团去信丰县参观。）

（5）政协工作的民主性和合作共事关系。从我参加县政协工作情况来看，情况是良好的，我是1986年才被接纳为中共党员的，“文革”前是以民主党派成员、党外人士身份参加政协工作的。就是在整风反右以后，我体会政协工作还是按民主程序来处理的，一切活动计划都是通过主席办公会认真讨论，送交常委会讨论通过再执行，作为党外副主席的我较多地负责学委会工作，而这项工作又是大头，都是由我提出计划安排意见而后讨论、修改并通过执行的。从县政协的

第三届二次会议以来，每年常委工作报告都是由我作的。从最近由县档案馆提供的有关资料查明，政协的有关计划、总结、纪要、决议等由我起草和定稿的总数在二十篇以上，几占这类文稿的百分之六十以上。这说明党对一个党外人士是寄予信任的。党内的合作共事关系也是融洽的。

二、十年动乱，政协名存实亡

1966年4月中旬，县政协秘书长袁正海同志还送了“县政协学委会关于1966年上半年组织各界人士参加双周学习毛主席著作计划的安排”草稿给我审批。稿件拿回去后，我不久即被隔离审查。这时我们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遭到了灾难性的破坏，县政协第五届委员会也被迫停止了活动，后来办公场所（现乐平镇富贵巷七号）也被挤占。恐怕是绝大多数的政协委员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揪斗、打击和迫害。据我所知副主席周志鸿、徐谦光受的迫害都不小，徐老在看牛期间竟不幸被毒蛇咬伤致死。我是被搞得家破人亡，不堪回首。政协组织实质上是被彻底砸烂了。

三、政协组织的恢复

历史前进的步伐是不可逆转的。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终遭灭亡，1976年末，“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也就结束了。从此，党的各项工作开始恢复正常，统一战线工作亦复如此。我省1977年就有了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着手抓这项工作。1977年6月省里就组织了一次全省

各民主党派人士参观团赴井冈山、长沙、韶山等地参观，由罗孟文同志领队。我有幸参加了这一活动。我理解这是统一战线、政协工作恢复的起步。1978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政协恢复工作就正式开始了。

我县政协在五届一次会议后就停止活动。六届一次会议于1980年12月14日召开，停滞了整十五年。要恢复政协，得进行大量准备工作。这一准备工作的内容我未亲自参加，但从六届一次全会徐炳和同志所作的五届政协常委工作报告中可知，主要有如下一些方面：

一、平反冤假错案。至六届一次全委会前夕，全县为一百七十余名被错开除工作的知识分子恢复、安置了工作。收回下放农村劳动的二百零三名原工商业者回城安置并补发工资。

二、对原划右派分子分别进行了摘帽、改正和安置。全县原有二百四十三名右派分子全部摘帽，改正的二百二十七人。按政策安置原右派分子以及受株连家属和因有右派言论等而被开除的一百五十人的工作，并处理了大量善后事宜。

三、基本上完成了把劳动者从原工商业中区分出来的工作。恢复劳动者身份的有三百六十一名。

四、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侨务政策、在台人员亲属政策。

通过以上各项工作，就在组织上为政协恢复作好了准备。

五、选定好修葺政协会址，调来干部积极筹划政协恢复工作。政协原址已成民房，而且地处巷内，交通不便，为恢复政协就得另选新址。当时县委书记王猷同志亲自过问，选好现在地点作为政协办公新址。调来罗定根同志任副秘书长

(专职、驻会)负责新址修葺和本会六届会议的准备工作。

六、召开县政协第五届二次常委会，准备常委报告和协商六届委员名单。1980年6月举行了县政协五届二次常委会，审议了五届委员会常委报告，酝酿了六届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名单。协商中基本上保留了原有委员，并有不少党内的老同志到政协任实职，新的政协工作从此就开始活动。1980年12月4日，举行了县政协六届一次全委会，会上选出郝力学同志为主席，高云龙、吴炳泉、孙树清、傅贵和我任副主席，高云龙兼秘书长，罗定根为副秘书长。郝力学等三十一人为常委，委员共一百一十九名。政协工作进入了新时期。

四、近十年的政协工作

县政协恢复工作至今又近十年了，其中已换届三次。今年四月举行了县政协第八届全委会。由于这段资料全，人都健在，所以，只想写我意识到的几个变化和一些基本情况。

(一)县政协近三届的基本情况

第六届委员会组成人员情况和主要负责人已如前述。第七届委员会一百三十一名，常委三十三名。主席为郝力学，副主席为汪国瑞、刘振明、高云龙、俞镇德和丁志仁。后又增补了毕国平为副主席。秘书长为朱成明。七届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于1984年6月召开。第八届委员会委员一百三十三名，常委二十七名，主席毕国平、副主席汪国瑞、江春娇、俞镇德、丁志仁和刘世平。秘书长袁启钧。八届一次会议于1987年6月召开。

第六届以来，每届均举行全体会议三次，常委会每季度

召开一次，主席办公会每月举行一次，这已成为制度。至于其它各种专题讨论会、座谈会，近年来举办的对话会等等每届都有二三十次之多，目前八届委员会即将届满了。

（二）近十年，即第六届委员会以来，我所意识到的政协工作的变化

1979年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同志所作《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的报告中，在列举了我国阶级状况、民主党派状况等的变化后指出：“上述各个方面的变化表明，我国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从此，政协工作进入了新时期。在这一新时期中，政协不仅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而且是我国政治体制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实行互相监督的重要形式。于是在政协工作中就产生了与以往不同的各种变化，现就我所意识到的简述于下：

（1）各级人民政协的地方组织已被确定为一套班子，加强和充实了领导力量。从第六届委员会起，县政协就有了专职的主席、副主席和常委。这些人选都象县委、县人委一样，由各上级部门批准后再经选举产生。县内各项大型会议，县政协的正、副主席都得出席并在台上就座。专职正、副主席根据县委安排，也要参与领导各项中心工作，蹲点包片。与此同时，充实了政协的工作班子，按最近省委、省政府下达文件精神，县政协工作班子（不含专职正、副主席、常委和调研员）应配备十三至十八人。在经济上是个独立建帐、财政单列的单位。

（2）政治协商、民主监督方面也有了很大变化。“文

革”前召开一些协商会议，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向委员和各界人士通报情况，在座者是聆听教诲，端正认识，改造思想以求统一。而这些年来，政协虽然有一部分会议仍承担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任务，但更多的是就有关问题征询意见。近些年来还召开过不少意见听取会、对话会……真是做到了广开言路，起到了为祖国四化献计献策的作用，是一条畅通的民主渠道。

（3）从参观、访问接受教育，向调查指导工作转化。过去政协组织的参观、访问活动是不少的，其目的主要是使参观者接受教育，改造思想；目前，这项内容也还有，但现在政协组织的视察、调查，更多地是为指导工作，给党、政领导提供建议。如第六届委员会期间就搞过五次专题调查，其中的关于“吃豆腐难”的调查，经向党、政领导献计献策后，这个问题得到了相应的解决，在群众中赢得了好评。又如第七届委员会期间就给县委写了十余篇调查报告供决策时参考，其中在县水泥厂进行提高产品质量的专题调查，帮助该厂找到了影响质量的四个主要矛盾，有效地为该厂经济改革、技术革新、提高质量注入了新的活力。

（4）发展政协“人才库”的作用，各工作组的活动日趋活跃深化，大力开展了社会的咨询工作，为四化建设做了不少实事。仅以1987年、1988年为例，农村工作在丁志仁副主席带领下从事的“万亩吨粮田”科研工作就作出了贡献。文卫工作组除早在1981年已建立的医疗咨询服务站方面作出贡献、赢得信誉外，1987年还组织十名委员深入山区开展医疗咨询，为县敬老院老人建立健康档案。1988年还办了两期青少年武术培训班，共培养学员三百人。工商、科技、教育等各组举

办各种培训班、讲习会共十一期次，培训了拖拉机手，缝纫、裁剪、刺绣能手，柑桔、红心李栽培能手等等。政协的文史工作组也在白手起家的基础上，出刊了四期我县的文史资料。

（5）积极开展了“三胞”工作，把对台工作列入了议事日程。“三胞”和对台工作，过去是没有做的，第六届委员会后，也提上了议事日程。政协每年中秋节都要召开“三胞”座谈会，从第七届委员会起成立了统一祖国工作组，动员开展“五个一”活动，做好了委员中亲属归国探亲的接待工作。

以上是我意识到的几个方面的大变化。总之，从这些变化中看到了“政治协商、民主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方针的贯彻；看到了中共中央提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制度日臻完善；看到了社会主义民主进程的加速实现。

由于本人政治理论水平低，三十五年又是漫长岁月，记忆所及难免有讹误之处，尚请各位知情者不断补遗，更恳请对不当之处予以批评。

八十回首话当年

——追忆我在乐平“文革”前的二十年

周志鸿

编者按：周志鸿同志是我县一位德高望重誉满杏林的老医师。他从事医务工作五十年，经验丰富，医德高尚，为保障人民健康而救死扶伤，活人无数。乐平解放后，他主特县人民医院工作，十七年如一日，呕心沥血，废寝忘食，为组建和发展我县的医疗卫生事业付出了艰巨的代价。五十年代末，他被授予高级知识分子待遇，并光荣地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曾连续当选一至六届县人民代表和县人民委员会委员；同时担任过一至五届县政协副主席，成为社会公认的知名人士。

“文革”期间，他蒙受冤屈，曾长期下放边远山区劳动。斯时，周已年愈花甲，犹不避寒暑，身背药箱，走村串户，为山区贫苦患者悉心治病，送药上门，深得千家万户的赞誉。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他落实政策，平反昭雪，恢复党籍，补发工资。他虽年过古稀，如枯木

逢春，老当益壮。退休后，仍孜孜不倦发挥余热，积极参加县政协举办的医疗卫生咨询工作，诚可谓“晚节犹香”。

时值周老八十寿辰，他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挥毫作传，写成《八十自述》一稿，长达一万五千多字，反映了周老一生发奋进取，自强不息，为人民的医疗保健事业奋斗不懈的革命精神，是一份可贵的资料。因受政协文史资料规定的时限和本刊篇幅的制约，今节选本文发表，以飨读者。并借此为周老祈福。

我出生于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父名英琼，母曾氏，兄弟三人，姐妹四人，我行六。原籍江西省于都县。于都在土地革命时期，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腹心地带，人民群众革命觉悟很高，我大哥周端朋在那时应征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在红色首都瑞金以东的闽赣战场牺牲，建国后追认为革命烈士。

我家本贫寒，无力供我求学，我之所以能读到江西省立医学专科学校（即今江西医学院前身），中间既感谢诸亲友的资助与帮忙，我自己亦“艰辛困苦，备尝之矣”。我于1917年发蒙读私塾，以后在本县读小学、初中，在赣州读高中，1933年秋考入南昌江西医学专科学校，正当我毕业实习之际，“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我国，从吴淞口登陆，爆发了淞沪战争。当时的江西是前方的后方，大批抗日受伤将士转移到江西来，兵站医院与后方医院，应运而生，江西大批医务人员纷纷参加抗日治伤工

作，我亦投身其间。

1938年12月20日，我奉命调到前线边沿地带景德镇，担任卫生署第八防疫医院医师。1939年夏，日寇飞机轰炸了景德镇河西老汽车站，炸死炸伤居民不计其数，由我负责抢救。同年7年，八防院又派我与两位护理员组成巡回医疗队，赴皖南最前线宣城、繁昌等县进行巡回医疗，历时月余返景德镇八防院。同年八月中旬，景德镇前街沿河地段爆发真性霍乱病，来势凶猛，八防院动员一切力量，从院长至工友，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群策群力，同心同德，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努力，终于把疫情控制住并扑灭了。

1941年4月我辗转回到赣州，任南昌转移来赣州的江西医学专科学校附属医院医师，兼江西省劳工医院医师。1943年提升为江西医专助教暨附属医院主治医师，兼江西省立赣州助产学校解剖教师。1944年提升为江西医专讲师暨附属医院外科副主任医师。1945年春节前，赣州被日寇侵陷，校院转移至宁都。这时校院经多次迁转，设备丢失殆尽，元气大伤。校院为紧缩开支计，决定疏散部分职工，我从大局着想，主动接受疏散。同年5月辗转回到于都老家，向同行友好商借得银圆10元，率领家小北上，原拟赴景德镇开业行医。抵乐平时，得到我爱人在助产学校同学石莹及其母蔡鸾（大寺上女子职业学校校长）的大力援助，留我在乐平开业。从此，我就与乐平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乐平这块美丽而富饶的地方，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起初，我借大寺上东岳庙（即今日总工会办公楼北面）开业，设病床和门诊室，1946年11月，我买了一幢土库屋，坐落在原周王庙巷十九号，并购制少量常用医疗器械，设简